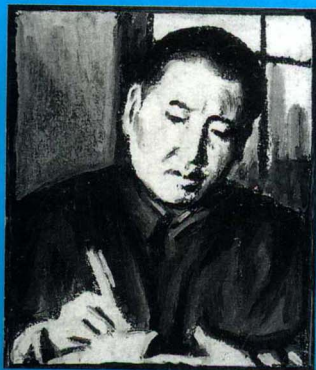


教余笔耕录

——
论文选
——

龙连荣
著



教余笔耕录

——论文选——

龙连荣 著

黔新出(2001 图)内资准字第 101 号

教余笔耕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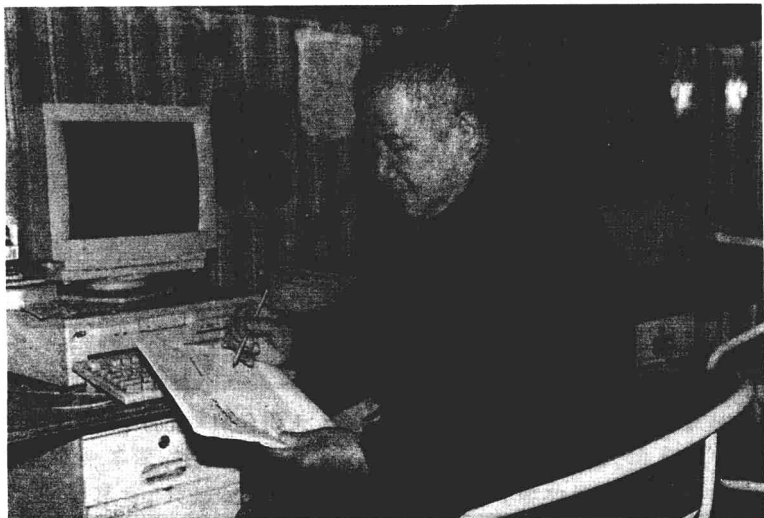
——论文选——

龙连荣 著

787×1092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85 千字

2002 年 3 月印刷 印数 1~200 册

工本费:22.00 元



古稀照

翁杰摄 2001 年

龙连荣 1931 年生，贵州三穗人，侗族，大学文化，终生从教，曾任小学教导主任，中师教员，师专副教授、系主任、学报主编等职；中国屈原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贵州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兼任黔东南州社科联副主席、州老年诗社副社长、州老年大学校刊和《霜枫诗刊》主编等。教余研究之一，是中国古今文学、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史，曾主编《黔东南当代旅游诗词选》，在《中国侗族教育史》和《霜枫诗选》两书中任第一副主编；主持龙绍讷《亮川集》点校，参加点校《孙应鳌文集》；参编西南和贵州师专、教院教材《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古代诗文讲析》、《孙应鳌研究》和贵州省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九、十册及其教学参考书等；出版《小学古诗讲析》和《教余笔耕录·韵文选》各一本；发表论文百余篇，诗、文 1000 余篇；共约 200 多万字。其中《试论〈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获贵州省社科优秀奖，另有多篇论文、诗歌、散文获奖或被有关书籍收录。现尚有《教余笔耕录》的杂文选、散文选、《对联研究》和罗隐《谗书注译》待出版。生平事迹被国内外 40 多种人物辞书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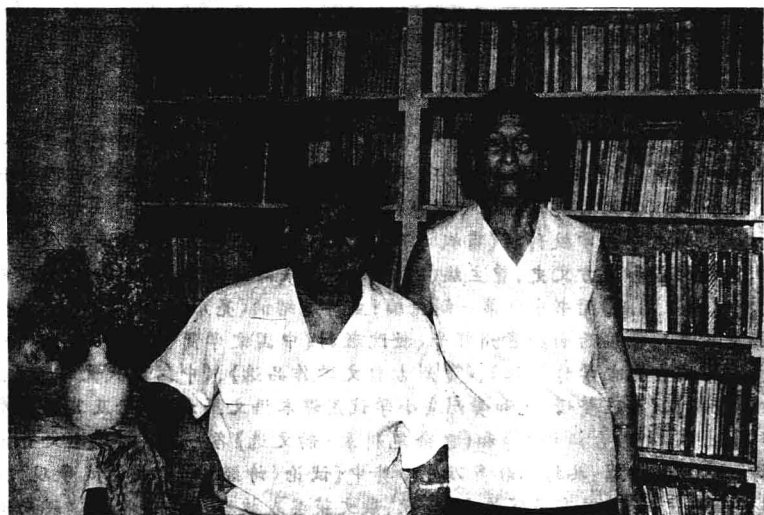
（录自《世界名人录》）



毕业照 1958年



讲学照 2000年



金婚照 1999年10月2日

《教余笔耕录·论文选》序

单洪根

龙连荣教授退休后，仍不舍专业，笔耕不辍。与此同时，将原发表于省、州内外报刊的作品选编成“论文选”、“杂文选”、“散文选”、“韵文选”等四册《教余笔耕录》丛书陆续印行，特约我为其中的《论文选》作序。这使我遇上了一道难题，实在有些诚惶诚恐。我和龙老师均毕业于贵师大中文系，他先我八年，应是我的老师。他一直从教，我于教缘分不深，主要忙于政务，无论阅历、学识、文笔，均自愧弗如。不过，出于尊重，只好把他提供的书稿，权当必读功课进行认真复习，不至于领了考题而交上一份白卷。

这本《论文选》的篇章大都写于七十年代末期之后，主要内容为孔“圣人”、孟“亚圣”的思想研究和孙应鳌、龙绍讷的学术研究，另有少数篇目则是对古典文学教学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孔、孟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之重要经典。古往今来，研究诠释，学者辈出；著书立说，汗牛充栋。但其内涵、其精义则随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感知也在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孔、孟儒学，犹如两座特富的大矿山，探之不尽，采之不绝，中华子孙，受用无穷。龙老师身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孔、孟思想体系，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和新的感知，选择孔、孟的相关言论，捭其精微，索其要义，分别命题，各个论述，单独成篇。如《孔子人际观撷谈》、《孔子廉政观撷谈》、《孟子的经济思想》、《孟子文学批评理论初探》等都是这样成篇的。其方法是以微观显示宏观，以孔、孟思想的各个方面逐步旁及孔、孟思想体系的全貌。这种方法，对作者是创作构想，是写作思路；对读者，则象游览北京的紫禁城，通过对各个殿堂、楼台、庭院的观赏，逐步领略这一古建筑群的泱泱大观。

从孔、孟儒学产生时算起,至今已两千五百余年。其间虽屡遭非议,甚至经历过“焚书坑儒”、“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中国思想史上荡起的阵阵风浪,但儒学的历史地位都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直至今日,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适用性。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遇到的许多新问题,似乎都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龙老师以此为出发点,对孔、孟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探讨,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他在对孔子的“义利观”进行深入分析后说,孔子“既反对唯利是图的纵欲,也反对义而不取的禁欲。其目的是要在‘义’的前提下,合理地解决公与私、己与群、为己与为他诸方面的矛盾,实现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使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稳定。”这“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又如他从“增强品德修养,发挥表率作用”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孔子的“廉政观”后,强调说:“反腐倡廉是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全国的人心所向。为了推进廉政建设,探讨一下孔子的‘廉政观’,恐怕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论文选》里,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总而言之,结合现实,研究先哲,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孙应鳌,清平(今凯里市)人,明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学识渊博,著作颇丰。龙绍讷,开泰(今锦屏县亮寨司)人,贵州晚清时期的苗族作家和学者。对于我州这两位古代名人,正如龙老师所说,“在文化发达之地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我州这样文化落后的地方,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他在《论文选》中,以较大的篇幅,就孙应鳌的生平、著作和教育思想,对龙绍讷的思想性质、文学创作、学术论文等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样作可扩大他们的影响,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对宣传黔东南,宏扬地方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必将发挥积极作用。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热爱乡梓,借助前贤,启迪后生,发展人文的拳拳之心。

以上这些,无所谓序,只是一篇蹩脚的读后感罢了。

目 录

试论《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	(1)
《穀之战》浅析·····	(10)
《道德经》的语言艺术·····	(16)
孔子人际观摭谈·····	(22)
孔子言行观摭谈·····	(34)
孔子义利观摭谈·····	(42)
孔子养生观摭谈·····	(49)
孔子修身观摭谈·····	(59)
孔子廉政观摭谈·····	(68)
孔子理财观摭谈·····	(75)
场景·人物·理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读后·····	(80)
《孟子》结构艺术初探·····	(84)
《孟子》论辩艺术初探·····	(96)
孟子的经济思想·····	(111)
孟子文学批评理论初探·····	(117)
略谈《孟子》的语言特色·····	(126)
《论语》、《孟子》训诂方法举隅·····	(132)
读《庖丁解牛》·····	(136)
屈原忧患意识管窥·····	(138)
比物类志 浑然一体	
——《桔颂》表现手法试析·····	(145)
《过秦论》的结构·····	(150)
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	
——浅谈《信陵君列传》(节选)中人物和情节的关系·····	(155)

读《搜神记》札记·····	(159)
罗隐和他的《谗书》·····	(166)
变化与反复的典范	
——以《指南录后序》为例·····	(175)
《郁离子》概说·····	(179)
孙应鳌教育思想简论·····	(185)
孙应鳌咏花诗浅评·····	(200)
苗族作家龙绍讷思想摭谈·····	(206)
清代苗族学者龙绍讷学术论文试评·····	(215)
龙绍讷文学创作初论·····	(224)
龙绍讷游记散文试评·····	(236)
清代苗族诗人龙绍讷山水赋简评·····	(245)
黔东南史上第一篇音韵论文	
——龙绍讷《五音说》初析·····	(252)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歌漫议·····	(257)
主动拿来 积极送去	
——论民族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65)
对古代诗文描写声音的技巧之探索·····	(271)
诗意+哲理:相得益彰	
——对诗歌进行议论的粗浅认识·····	(277)
关于中学语文课本中古代诗文结构分析的几点浅见·····	(286)
中学文言诗文的阅读心得和问题探讨·····	(300)
古分今合词解·····	(318)
《祝福》结构异议·····	(325)
读、写结合问题琐议·····	(331)
部分论文选目·····	(341)
后 记·····	(344)

试论《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在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为了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我国古代大约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劳动产品有剩余,于是就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部落之间也随之不断发生战争以争夺财富和劳动力。这时,氏族组织解体,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公社便逐步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所代替。史书所谓“禹传子不传贤”、“家天下”,就是这种转变的反映。据此,建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朝,可能就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到了公元前 16 世纪,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族,因使用金属农具,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都有相应的发展,灭夏建商后,借助政治上的力量,推动经济、文化的进步,使奴隶制有了发展。但因后来的统治者残暴腐化,终于激起奴隶的反抗,商朝于公元前 11 世纪被黄河上游的周族所推翻。周王朝的统治者接受“殷鉴不远”的教训,不仅政治上分封诸侯以卫王室,制礼作乐以维护其统治,而且大力发展生产,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造成奴隶制的极盛。这便是史家所乐道的“成康之治”。其后,统治者恣意压榨,享乐奢侈,致使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不得被迫东迁洛邑。从此,天子权力下坠,王室名存实亡,诸侯相争不已,这就是《三字经》所说的:“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这个时期,奴隶制趋于崩溃,封建制酝酿形成。

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共收入公元前 11 世

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这时，正好相当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先有武王伐纣的战争，接着又有东征之战，西抗西戎、北御猃狁和南征荆楚之战，随后便是连年不断的诸侯争霸战争。作为这五百多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诗经》，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艺术而真实地表现了奴隶制从鼎盛趋于崩溃的全过程，而战争，就是这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这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据查，《诗经》中直接和间接描写战争的诗作，“风”诗有十多篇，“雅”诗有近十篇，“颂”诗不低于三篇：合计有20余篇，占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七以上。这些写战争的诗作，涉及的人，上有最高统治者周武王、周宣王，有诸侯国的国王，有大臣、名将，有贵妇人，下有普通士兵、戍卒及其家属；涉及的面，有应征的踊跃，有操练的严格，有行军的威武，有战场的厮杀，有生活的艰苦，有斗争的紧张，有思念的剧痛，有不平的埋怨等等。总之，这些诗作都是现实主义的，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客观实况，也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种种战争的主观看法，这就是战争观。依据其诗作来探讨一下《诗经》描写战争所体现出来的战争观，这对研究《诗经》无疑有所裨益，就是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关于战争与和平观点的形成及其演变、对于研究军事理论，也是不无意义的。

战争，人们凭常识都懂得，这是一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不仅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而且会影响生产和生活，造成家人离散、田园荒芜、经济破坏和民不聊生。正因为如此，《诗经》中多数描写战争的诗作都是怨恨和诅咒战争的。这是《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士卒的苦况。首先是服役时间过长。据《击鼓》诗疏引《韩诗》，说周制是“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这就是证明。《击鼓》所写的那个士兵，“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后，“不我以归”，却让其留守南方，关山相隔，别离又久，使他不能履行与妻子立下的“死生

契阔”之誓言而万分痛苦。《君子于役》则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丈夫行役时间的漫长和归期的难卜。服役原本是有时限的，可一旦被征入伍，便“不知其期”、“不日不月”，变成了无限期的长期服役，这怎能不叫征人思家、思妇念夫呢？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写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服役期长达六十五年，这或许是古今中外独占鳌头的服役年限。杜甫《兵车行》中“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说的服役年限也相当长。《诗经》虽不如这两首诗写得具体，但服役期限漫长，从上述所引诗作看出，是肯定而毋庸置疑的。其次是生活条件极差。先看吃吧，当时生产力低下，产品不多，积蓄当然也不可能很丰富，加上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一旦战争爆发，人马大量集中，吃的自然就成为大问题。《小雅·采芑》写道：“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我们读后即可看到一幅身穿甲冑的成群武士，为解决食物问题从这片菜田到另一菜田采摘芑菜的图影。《小雅·采芑》反映的是宣王时方叔南征荆楚的事，重在为周朝贵族纪功，尚且还泄露紧张训练和临战前将士都采芑充饥的苦况，那长年屯兵荒漠、戍守边陲的生活境遇，自然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王风·君子于役》中，那位思妇感叹久役于外的丈夫“苟无饥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戍卒、征人饮食之无保障和生活之艰难。至于住嘛，那就更糟了。他们“行枚”上战场之后，即使停止了厮杀，也只能象“蜎蜎者蠋”那样“烝在桑野”，“孤身独睡缩成团，兵车底下权当床”，过的简直是野兽一般的生活。再次是战斗紧张而频繁。《小雅·采薇》写道：“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日三捷”和“岂不日戒，玁狁孔棘”。这说明对手强大，来犯紧急，随时都得高度戒备，处处都得小心警惕，这哪能让人悠闲轻松呢？这种“不敢定居”而必须“日戒”的情况，《小雅·何草不黄》有进一步的描写：“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至于战场上的拼死，那就更为惊心动魄、令人胆寒了。《邶风·破斧》中，写“既破我

斧，又缺我斨”、“既破我斧，又缺我鍬”、“既破我斧，又缺我鉞”；斧、斨、鍬、鉞等金属兵器，“既破”、“又缺”，可见武器破损数量之多和程度之重，那手执这些武器进行战斗的士卒，拼杀场面之激烈和战斗时的出生入死，我们就不难想象得到了，这正类乎唐人边塞诗所写的“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情形。最后是军中的不平等。《小雅·采薇》中对此有具体的描写：“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驾彼四牡，四牡骎骎。”“四牡翼翼，象弭鱼服。”马儿高峻雄壮、战车高大威武、武器精良超群，但都是“君子(将帅)所依(乘坐、使用)”的，至于“小人”(士卒)，只能以它作掩护，隐蔽于其后而往前徒步冲锋。《郑风·清人》所写的人和事，是史有确证的。公元前660年，狄攻破与郑隔河相望的卫国，“郑人恶高克”，就故意使大臣高克帅兵驻扎在黄河边上，直至狄退兵之后，“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驷介旁旁，二矛重英”、“驷介鹿鹿，二矛重乔”和“驷介陶陶”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支精兵，如果说，先前调去黄河南岸驻守以防狄的侵犯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当狄已退兵，就因郑文公与高克有些矛盾而迟迟不予撤回，置广大士卒于不顾，致使长期离乡背井，蒙受闲置冷落、有家难归之苦，这种以士卒青春、痛苦来泄私愤的作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毫无道理了。至于那以士卒生命为儿戏，把他们作为战争工具任意驱使，造成他们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夫妻团圆而抚育子女以过正常人生活的恶果，就更是极大的不平等了。这一切，都是阶级对立在军队中的反映。人民之所以怨恨和诅咒战争，我们读了上述诗作，就不难明白其原因了。

第二方面是思念的痛苦。《邶风·雄雉》是一位妇女思念远出的丈夫的诗，其作者，有的专著认为“大致属于贵族阶层”，因她具有文化教养又多情善感，自然要追求丰富多采的感情生活，于是对久役于外、长年不归的丈夫思念得特别强烈。触景生情，这本是人们普遍的一种心态，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那样：“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界事物中实现他自己。”雄雉的鸣叫，别人听来或许漫不经心，但有丈夫行役在外的妇女，见到“雄雉于飞”，又听

到雄雉忽高忽低类似由近而远的“下上其音”，“心有灵犀一点通”，便自然联想到别妻在外、离家渐远的丈夫，于是发出“我之怀矣，自诒伊阻”、“展矣君子，实劳我心”的痛苦感叹和“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的极度哀吟。贵族妇女尚且因战争而夫妇分离，那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王风·君子于役》，从诗中所选取日暮黄昏时乡间的“鸡栖于埘”、“羊牛下来”来看，其作者当为一位农妇，她也是从所见的鸡进圈、羊牛回栏而想起了久役于外、不知归期的丈夫的，从而发出“曷至哉”、“曷其有佸”的疑问和“如之何勿思”的哀叹。《邶风·击鼓》，则从久戍于外的士卒角度，写出士卒对家中妻室的无限怀念。夫妻在一起时，男的曾“执子之手”，表示“与子偕老”，并发誓“死生契阔”，永不分离。尽管言犹在耳，也牢记于心，可无情的现实却征其入伍，还“我独南行”到那陌生的地方去征战、戍守，弄得没有住处，还丢失了马匹，举目无亲，于是痛苦地呼喊：“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长久思念，无法解脱，有的思妇就大声疾呼：“振振君子，归哉归哉！”（《召南·殷其雷》）有的则在丈夫出征之后从不打扮，让其“首如飞蓬”，直到“愿言思伯，甘心疾首”也心甘情愿，甚至去找忘忧草来排遣难消的思念（《卫风·伯兮》）和解脱那思夫而“心疾”的痛苦。

第三个方面是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艰难。《邶风·东山》写的：“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这决不是艺术的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史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后二年（前1025年）死去，其子成王继位而年尚幼，由其弟周公姬旦代行国政。这时，纣王之子武庚以为有机可乘，便拉拢武王之弟管叔等人，勾结原商之嬴姓同盟国徐、奄、盈以及熊、薄姑等东方民族、邦国发动叛乱，于是周公被迫领兵东征，历时三年方平定叛乱，诛杀武庚、管叔等，解除了周初统治的危机，这无疑是西周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文献不足，三年的平叛战争，到底给生产带来多大破坏，给人民生活造成多大影响，这不便信口雌黄；但时间有三年，地域也不窄，可以肯定地说：破坏是不小的。《东山》诗中所写的仅是后方，生产、生

活受到的影响且如此之大,使昔日的庭院、园圃都成了野鹿活动的场所,夜间有令人不寒而栗的“熠熠宵行”,那直接作为战场的地方,其所受破坏程度之严重,人民生活之艰难,自然就远甚于此了。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

在《诗经》所反映的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战争中,有的战争虽不能说是“革命和革命战争”,但因它基本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所以《诗经》中有一部分诗作对这类战争是理解和支持的。这是《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的另一个基本观点。

《卫风·伯兮》中的那位妇女,盛赞其夫“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不禁为之骄傲自豪,就是因为她壮健、威武的丈夫能手执武器去“为王前驱”,做一个保邦卫国的英雄。西周时期,王权鼎盛,故“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到了“王纲坠”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也还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故能够“为王前驱”自然有一种洋洋自得之感。这在《秦风·无衣》中可得到进一步证明。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处西方,与西戎争战甚多,从“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起,经历庄公、襄公、文公,直至秦穆公三十七年“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罢西戎”为止,秦与周王朝的命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诗中所言“王于兴师”,按朱熹《诗集传》的解释,系指“以天子之命而兴师也”。因西戎是游牧民族,强悍勇猛,春秋末期以前,经常侵扰边境,而与之毗邻的秦更是首当其冲,人民常受其害。故秦“以天子之命而兴师”,实属自卫性的反侵略斗争,它的目的,不言而喻当然是为维护秦的领土完整和统治的稳固,但对秦地人民免遭外族奴役、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尽管被统治者压榨得“无衣”,当外敌入侵“王于兴师”之时,也都“修我矛戟”、“修我甲兵”,自动“同袍”、“同泽”、“同裳”,甚至还要“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全诗充满慷慨激昂、热情互助的气氛,积极备战的紧迫感和同仇敌忾的参战渴望,

洋溢在字里行间，真不愧为一曲共赴戎机的军歌。这与前面那些怨恨、诅咒战争的诗作，简直有天壤之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类战争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这种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时人民便自觉放弃阶级斗争而决心为保卫祖国安全和民族生存而战的态度，这种维护正义、主权和尊严的民族精神，这种熔爱国主义、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为一炉的民族正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的。

这类理解和支持战争的诗作，也表现在赞扬军威和欢呼胜利上。如《大雅·江汉》的一和二章：“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江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大家知道，《大雅》中多数诗作，也包括这篇《江汉》的后四章，其内容都是宣扬君明臣忠和文治武功的，的确不值得称道，但这二章却以“武夫”（广大将士）为描写对象，首章写誓师就道的场面：将士们士气高昂，斗志坚决，声势浩大，行动起来，犹如长江、汉水汹涌澎湃的浪涛一般，这就突出了王者之师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锐不可当的特点。第二章虽未直接描写这支部队的征战场面，但“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已从侧面表现了它的所向无敌，并为后面显示“匪疚匪棘”的文治作好了铺垫。《秦风·小戎》，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在表达对驾驭兵车随秦襄公出征西戎的丈夫之思念的同时，也在每章的前六句赞美了秦国兵车的精良、战马的雄壮和驾车“君子”的威武：“小戎伐收，五檠梁辀。游环胁驱，阴鞿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骐驎是中，騊駼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觶鞶”、“伐骊孔群，公矛鋈铎。蒙伐有苑，虎铉鏐膺。交铉二弓，竹闭緌滕”。因东周初年，西戎骚扰不休，秦襄公奉命率师讨伐西戎，不仅解除西部边陲的战乱，也使秦人生活逐渐趋于安定，还为秦以后的强大奠定了基础，故人们是理解和支持的。这正如朱熹在《诗集传》中所说的：“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与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故其从役者之家人，先夸车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盖以义兴师，则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应该说，朱熹的话是符合其诗所反映的内容而评价得中肯的。《小雅·采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堪称最有代表性，全诗四章，分别写练兵、行军、誓师和取胜的全过程，不仅面广而井然有序，而且生动而颇有气势。练兵时，“其车三千，师干之试”；行军时，“其车三千，旂旐央央……约軹错衡，八鸾玼玼”；誓师时，“钲人伐鼓，陈师鞠旅……伐鼓渊渊，振旅阗阗”；作战时，“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加上这支部队曾经北伐克玁狁，故被征伐的荆蛮闻风丧胆，一出征，便“执讯获丑”，打得荆蛮束手就擒。诗作还用鸛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飞禽作比喻，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展示了将士的勇猛和动作的敏捷。

当时的人民大众之所以能理解、支持战争，除了人民大众凭直觉认识战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之外，统治阶级的宣传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比如《大雅·常武》就吐露了这方面的信息：“赫赫明明，王谓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警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既然最高统治者周王如此向他的大臣宣传，难道他的统兵大臣不会如法炮制又去宣传所统帅的将士么？不然的话，那“忧心烈烈，载饥载渴”的将士，何以知道“靡室靡家”、“不遑启居”和“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都是由于“玁狁之故”呢？统治者的宣传是收到效果的，《小雅·出车》就足以说明。该诗是写西周大将南仲带兵抗御玁狁的。一、二章以南仲的口吻，先写强大周师闻警而动，天子命我为将，于是立即集结军队整装出师，去为“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分忧。如果说，这是周王宣传大臣的效果的话，那么，第三章则体现了宣传军士的效果。第三章是以军士口吻来写的，先写“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后写“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生动地体现了全军上下同仇敌忾的昂扬士气，显示出“出车彭彭，旂旐央央”的强大威武。

《诗经》中这类写国仇和私怨并存的作品，将爱国精神、同仇敌忾